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青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

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

房忆萝 / 著 | 现代出版社



我是一朵 飘零的花

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

房忆萝 / 著 |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房忆萝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244-122-4

I. 我… II. 房…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2867 号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

著 者：房忆萝
责任编辑：刘宝明
特约监制：辛海峰
特约编辑：马南山
装帧设计：门乃婷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 话：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www.xiandaibook.com
电子信箱：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7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4-122-4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倘若,每一个远离故土的男孩都是一株无根的草;那么,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女孩就是一朵飘零的花!我们用青春和血汗繁荣了别人的城市,却荒芜了自己的家园!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于打工者特别是打工妹这个群体,一直存在诸多偏见,人们习惯于用猎奇或鄙夷的目光来猜度她们的生活。我的这篇自述,则是最全面、最真实的打工者生活写照。

——题记

前 言

新中国成立后,有两次大规模的全国性人口流动。第一次,是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数的城市人怀着一腔热血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光荣的知青;第二次,便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人或城市贫民背井离乡,成为一名打工者。这两次人口流动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不同的是: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工者则大多是从农村涌进城市。

当年的知青,其实还是享有城市人的某些特权,但现代的这些打工者,却受尽屈辱和冷眼,换来的仅仅是一点点可怜的血汗钱,就是这点血汗钱,还要将大部分寄回家,给年迈的父母支撑家庭,给幼小的弟妹读书学习;他们整天与机器为伴,在流水线上忍辱负重,被动地、默默地忍受着诸多生存的艰辛与磨难。更可悲的是,虽然他们谦卑的身影无处不在,但囿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被这个社会忽略和漠视。

尽管我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无能为力,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亲历并目睹了无数打工者的痛苦、无奈,甚至是悲惨的遭遇,个中滋味实在是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记录下来!

我的这篇自述,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原生态打工者的生活写照!它是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真实见证:“世界工厂”的称谓,承载着无数打工者的青春和血泪!若干年后,当人们赞美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



- 第一章 南下 / 001
- 第二章 进黑厂 / 019
- 第三章 9.5 元工资 / 039
- 第四章 治安员 / 059
- 第五章 解雇 / 079
- 第六章 好厂 / 099
- 第七章 沈洲 / 121
- 第八章 内聘 / 143
- 第九章 升职 / 163
- 第十章 淡季 / 181
- 第十一章 辞职 / 199
- 第十二章 采编 / 209
- 第十三章 钓老板 / 223
- 第十四章 流产 / 243
- 第十五章 归途 / 249



第一章 南下

我出生在四川盆地中部一个叫槐树坪的小村庄。槐树坪既不是开阔的平原，也没有名川大山，到处是绵延不绝的丘陵。丘陵的形状正如人的相貌一般，有的温和，有的嶙峋。在我还小的时候，站在丘陵上往下看，一条条溪流碧绿如玉，欢快地绕过槐树坪，流向不知名的远方。村前屋后到处是绿油油的水稻、黄灿灿的油菜花以及随风摇曳的芦苇，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腥香和青草的芬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宁静而安详。

那时候，槐树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人们都还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小屋中。这些小屋都是由泥坯盖成，上面铺着稻草。小村不知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风雨侵蚀，早已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幽暗而静默。在村口望进去，村尾就成了一团灰黑的东西。人一走进小村，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树叶繁茂的老槐树，左边一口水井，右边一个祠堂。井边整天哗啦啦地飞溅着晶莹的水花，把女人们的笑声和歌声传得很远很远。

特别是到了夏夜，村里的狗们对着天上的月牙儿直着脖子“汪汪”地叫。村里的人们则扶老携幼聚在那棵老槐树下，摇着半旧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这个时候，也是孩子最热闹的时候，有的孩子静静听大人讲着很久以前的故事，有的则欢快地追逐嬉戏，即便是再调皮的孩子，家人也不会呵斥。

槐树坪的土地十分肥沃，除了每年两次的双季稻外，还盛产上好的芦苇。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苇芽便如一支支绿色的箭，仿佛是眨眼之间便从土地里冒出来。刚冒出的苇芽是可以吃的，剥了一层皮，便露出了里面嫩白如玉的苇肉。特别是苇芽炒辣椒，有点苦，但味道十分鲜美。

再一场春雨过后，苇芽便冒出一尺多高，苇子叶尖而长。到了五月，芦苇就有了一丈多高，苇叶宽宽大大，端午节正好用来包粽子。冬天到了，苇叶黄了，便开满雪白的芦花，芦花毛茸茸的，风一吹，千朵万朵，漫天飞舞。芦花飘扬的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砍芦苇编苇席，几乎每家都有一两个编苇席的好手。双季稻一半交公粮一半留着自家吃，多数人家是靠编苇席卖的钱换得油盐酱醋，日子过得拮据而宁静。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村变得不平静起来了。很多人丢下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和编苇席的手艺,翻过延绵不绝的丘陵,到外面的世界去了。他们凭借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在城市或城市的边缘,干最脏最累的活,不分白天和黑夜。他们毫无保留地参与城市建设,却还要忍受着数不清的白眼和屈辱。他们通常做的职业多是被人称作低级的,一般是建筑工人、装修工、搬运工、棒棒工、保姆、修鞋补锅匠、流水线工人、保安、矿工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小贩。

这些人外出打工后,家乡属于他们的责任田因为无人打理,原先长满庄稼的土地便荒芜起来。土地失去了主人,任由一片片的野草疯长开来。几年后,外出打工的人们便会回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推倒住了几十年的泥坯房,在自家荒芜的田地里盖起了一幢幢平房。于是,布满平房的地方便成了新村,原来的地方便成了老村。

转眼之间,老村便只剩十来户人家了。水井边长满了青苔,石磨也废弃了,满是腐烂的落叶。就连那些泥坯房,似乎也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调皮的孩子一扒拉,墙上干枯的泥沙便会刷刷地往下掉。很多人家为了多占一份宅基地,老屋就废弃在那儿,墙上塌陷的洞口深深的,结满了蜘蛛网。人一走进老村,世界似乎一下子变得清静了,仿佛与世隔绝一般。

留在老村的人,或是出不去,或是老实到不敢出去的,守着几亩薄田,养着几头猪,编编苇席勉强度日。不幸的是,我爸爸就属于老实得不出去,所以我们家便成为留在老村里的十来户人家之一。

爸爸妈妈最常念叨的就是,什么什么东西又涨价了!就连化肥也一个劲地往上涨,买了化肥,还抵不过收获的谷子;不买化肥吧,谷子又收不上来。好在老村人还有编苇席的手艺,一到农闲,便像以前那样,扣顶草帽,握上短刀,到溪边将芦苇割回家,然后经过一系列繁杂的工序编成苇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买苇席的二道贩子统一收购运到城里去卖。

但即便是爸爸妈妈这样长年累月地劳累,却还时常交不起我和弟弟越来越昂贵的学费。爸爸妈妈编苇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那段时间,依靠卖苇席的钱,生活虽然艰难,倒也可以勉强维持。

可忽然有一天,买苇席的二道贩子再也不来了,并传回话来说,苇席本来不值几个钱,现在油价又一个劲往上涨,城里还要查超载车,运费一下子蹿上去一大截,亏本的买卖谁愿意做?

我们家本来就穷,供我和弟弟读书已是捉襟见肘,要是我考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起呢。所以那段时间,我成绩越好,爸爸妈妈就越是担心。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在山西做矿工的二叔正好回家。二叔这几年一直在做矿工,去年也在新农村里盖了平房。他说有一家私人煤矿正在大量招工,我们村有很多人就在那里做事。

爸爸这次不再犹豫,跟着二叔及邻村的十几个人去了山西大同。

原以为爸爸外出挖煤可以改变我家的贫穷状况,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爸

爸的外出竟是我们家不幸的开始！后来发生的事，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爸爸出事的那年夏天，我19岁，刚刚参加完高考。此时，距离爸爸外出挖煤还不到两年。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迎来了一个潮湿阴霾的早晨，昨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每到这样的天气，妈妈的关节炎就会犯病，于是就整天整天地躺在床上，直到天晴才能起床。

按理，妈妈早该去医院看病了，但现在医院把病人当作敛财的工具，医药费实在是贵得离谱，在农村，一般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所以妈妈一直是硬挺着。穷人的命，原本就是不值钱的。何况如果我考上大学，家里还要负担那如天价一般的学费，她就更加不敢去医院了。

12岁的弟弟海鸥吃过早饭便出去玩耍了，我收拾完了碗筷对躺在床上的妈妈说：“妈，我想去学校看看通知书有没有来。”

妈妈担心地说：“海燕，你不会落榜吧，我这几天右眼皮跳得厉害呢。”

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放心吧，我平时成绩那么好，这次发挥也不错，我感觉肯定能考上。”

妈妈的眉头却皱得更紧了：“那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这样厉害呢？”

我娇嗔地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迷信？”

话音刚落，忽然听见院内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一看，门外除了几个邻居，还有一个乡邮递员。邻居们看到我，全都欢天喜地地说：“海燕，你考上大学了。”

尽管早有预感，但这消息还是让我欢喜雀跃，特别是我看到通知书上北方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名时，更是激动万分。

躲在床上的妈妈看到通知书，也很高兴。但邻居们走后，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了。我意识到什么，心里一沉：“妈，学费这么贵，我们家有这么多的钱吗？”

妈妈暗中算了算：“这些年，我和你爸一直给你攒着的，不过去掉你和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五千呢。”

我急了：“离开学没多少时间了，那怎么办啊？”

妈妈叹了一口气：“等下去给你爸写封信吧，他现在在煤矿都干了半年多了，挣的钱应该不止五千。”

我愁眉苦脸地说：“煤矿是一年一结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妈妈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实在不行就叫他回家吧，听说只要有事回家，煤矿就提前给结工资。”

我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我拿着写好的信，正要上镇上邮递，忽然听到外面传来若有若无的哭声。这声音先是一个人的，但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哭的人也越来越多，好像整个村子都有人在哭。我大吃一惊：“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焦急地说：“快去看看，可能是谁家死了人了，怪不得我这几天右眼皮总是跳呢。”

还没等我站起身,就见海鸥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扑到妈妈怀里哇哇大哭:“爸爸,爸爸,他,他可能死了!”

我和妈妈立刻呆住了。妈妈一脸死灰地盯着弟弟,几次张开嘴唇,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颤抖着声音问海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爸爸、爸爸他人在哪里?”

海鸥边哭边说:“听说山西煤矿瓦斯爆炸,爸爸、二叔还有我们村和邻村的很多很多人,全都被埋在地下了。”

听到这里,妈妈呆了半晌,忽然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我的人哪……”便下意识地想下床,因为双腿僵直,她一头栽在地上,再抬头时,额头已流出鲜血。我和海鸥此时也管不了她头上的血,双双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

整个槐树坪和我们家一样,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虽然还没有明确传来死讯,但村里村外很多青壮年男人都在煤矿挖煤,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瓦斯爆炸后井下的人几乎是无生还可能的。

无论是老村还是新村,现在留在家里的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是名副其实的“空巢”。未婚女孩和男孩如不能继续读书,大多到江浙广东一带的工厂打工。结婚后,女人便留在家中带孩子、照顾老人,男人则到很远的煤矿上挖煤或到建筑工地做苦力。因为挖煤和做苦力的钱比在工厂打工的钱要多一些。

和爸爸在同一口井里挖煤的,全是我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其中以我们槐树坪最多。

当天下午又有消息传来,我们村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那个口井里,还有四个人是在另一口井的。于是我和妈妈、弟弟便又生出一线希望来,希望我爸是那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村里很多人家和我们同样的想法,于是哭的人少了,希望和焦虑的气氛又弥漫在村子上空。全村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自觉地从家里出来,焦虑地站到了村口。我和海鸥也搀扶着妈妈走出家门,我们忧伤地望着唯一一条通往村外的路,无限期待又无限痛苦。

其间不时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传来,但直到第三天中午,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忽然,刚才还骄阳似火的天下起了毛毛细雨。但没有人回家,因为有消息说,今天煤矿里可能会有人回来。

雨越下越大了,我正要扶妈妈回家,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有一个小孩欢叫起来:“爸爸,我爸爸回来了!”

我们赶紧往大路上望去,雨中真的有四个人影向这边走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个大大的尼龙包,好像很轻,又好像很重。四个人中有我的二叔。我和妈妈、弟弟赶忙跑到二叔身边,向他打听爸爸的消息。二叔和其余三个人一样,身边很快聚集了很多亲人。

我妈颤声问:“二弟,你哥呢?”

二叔的眼泪忽然就流了下来,哽咽着说:“嫂子,哥哥他跟我一起回来了。”

说完这话,二叔下意识地拉紧他手中的尼龙包带子。我的目光不由向那个尼龙包望去。这包很大,二叔的尼龙包上面印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其余三个人身上的尼龙包也和他背的这个一般大小,虽然条纹不同,但同样都是崭新的。按理,尼龙包里面装的应该是衣

物什么的,但他们身上的尼龙包却呈现奇怪的形状,仿佛里面装的是硬物一般。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天依然阴得可怕。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整个身体像是掉进了冰窟窿。我想抬起手摸摸那尼龙包里是什么,但我的手,却像有千斤重。

海鸥听了二叔的话,惊喜地跳起来:“爸爸还活着,我爸爸还活着。”

妈妈却疑惑地问:“跟你一起来了,那人在哪里呢?”

二叔叹了一口气,刚把尼龙包从身上放下来,旁边忽然传来响亮的哭声,仿佛哭也会传染一般,好多人的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我、妈妈以及围住二叔的亲友全都朝旁边望去,只见和二叔同时回来的三个人已经将尼龙包打开了,尼龙包里哪里是什么衣物,分明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

我再回过头来时,二叔已经将他的尼龙包打开了,同样是一个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我一眼从放在最上面的那个骨灰盒上看到了爸爸的名字,“杨战良”三个字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我悲伤地叫了一声“爸爸”,将骨灰盒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则一下子瘫倒在地,昏了过去。

爸爸死了。在这次矿难中,我们村和邻村共有 38 个青壮年男子不幸遇难,年龄最小的 18 岁,最大的 54 岁。

二叔四个人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二叔他们今年去得晚,爸爸所在的煤矿里已经不需要人了,他们就到另一个老板的煤矿里做事。瓦斯爆炸后,爸爸所在煤矿老板连夜逃走。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一度被有关人员封锁,致使救助不及时,矿井里的 38 人全部遇难。

这 38 人,全部是我的父老乡亲!

因为是私人小煤矿,煤矿所在的山头像这种小煤矿遍地开花。因为随意开采,经常出现矿难,所有的用工手续及安全措施都不完善,至于企业注册什么的,更是奢谈。

尤其让人寒心的是,处理这次矿难事件的一位领导竟然说:“此次矿难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要求还差得很远,所以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死负主要责任。”

连领导都这样说,二叔他们仅剩的几个人知道告状无门了,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煤矿老板逃走后,人们除了知道他名字叫齐友德,湖南人,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

偌大的中国,要想凭这一点线索让警察逮捕逃犯,无异于天方夜谭。何况,就是这一点线索,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

齐友德,你不得好死!这句话,被我们无数张嘴重复着,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即便是家里没有死人的,也都和死去的这 38 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人家的门前竖起了白幡,进出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哭到声音嘶哑。

我知道这样是不合理的,煤矿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应该有人为此负责。但因为齐友德



的逃走,相关部门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了,说他是私自采矿,原本就是非法的。再加上我爸他们又没和齐友德签订任何合同,更别提买保险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村中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很多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家了,村里的人似乎忽然多了起来,但人越多,悲伤的气氛却越是强烈。

几乎是一夜之间,村子西边的半山腰上,竖起了一座座的新坟。

妈妈的头发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白了,海鸥也好像懂事了许多。办完爸爸的丧事,家里还剩下500多块钱。望着那叠薄薄的钱,我知道我的人生因爸爸的去世彻底改变了。

奇怪的是,我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连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那一刻,我对自己充满了仇恨,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最亲爱的爸爸。

我可怜的妈妈,即便是这样,她仍然记得要我上大学。刚送走爸爸,她就把我叫到面前,无奈地说:“海燕,快开学了,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上学了,我们也去申请贷款吧。”

我难过地摇摇头:“听说现在贷款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谁想贷就可以贷的。更何况,还有你和弟弟,我不可能在家里连吃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背着债务去上大学。”

妈妈叹了一口气:“委屈你了。”

我安慰她:“妈,你快别说了,我不去念书了。”

妈妈流着泪,什么也没说,只是眼里满是内疚,妈妈的内疚让我的心如针扎般地疼。

从上学的第一天,我就一直把考大学定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不仅我是这样,几乎每个农村孩子都是如此。贫困拮据的家境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的刻苦勤奋加上聪明好学在十里八乡也是远近闻名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三名。

自小到大,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周围所有人都在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城里的一切都是现代的和令人向往的;农村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和可鄙的,父辈们对于土地的传统依恋被视为愚昧的象征。从出生在农村的那天起,似乎一生之中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这片滋养我们又吞噬我们的土地。然而森严的城乡壁垒,使得通往城市的道路狭小并且漫长。一直以来,我们只有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更多的人选择早早辍学,外出打工。

所以,妈妈和我都十分清楚,对于一个农村女孩子来说,不去上大学意味着什么!运气好的嫁一个好男人生儿育女劳碌一生;运气不好的,嫁一个脾气坏又不顾家的男人,那就要过一生悲惨的日子了。

但爸爸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倒了。妈妈身体又不好,海鸥还年幼,我知道作为长女,我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上大学,而是要照顾好这个家。

就算贷到了款,我走后,妈妈和海鸥以后靠什么生活?何况海鸥也还在读书呢。除非现在天上能掉下一大堆钞票,但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当天下午,我就带着

海鸥来到爸爸的坟前，毫不犹豫地将那张录取通知书烧成灰烬，流着泪对爸爸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供海鸥念最好的大学。”

海鸥忽然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杀死齐友德那个坏蛋！”

这正是我心里一直想的。我紧紧握住海鸥的手，坚定地说：“爸爸，你安息吧，我一定要找到齐友德，为你报仇！”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海鸥开学了，区区的500块钱再去掉弟弟的学费及各种费用，便寥寥无几了。按我们家的现状，妈妈身体不好，海鸥年幼，我应该待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但待在家里却又连农活都没得做，因为我们村每个人的口粮田只有区区两分。

村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办完丧事后，很快又回去了。他们得知我不去读书后，都表示可以带我走。但我几经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我不想走得太远，只想在县城找一份工作，这样家里有了事也好照应。得知我的想法后，村里嫁到县城的一位本家大姑找到我家，她说她在县城开了一家理发店，我可以到那边和她学习理发技术，出师后也可以自己开店。

妈妈当即拒绝：“我不同意海燕去学理发，整天把男人的头抱在怀里，像什么样子！”

虽然我也对理发抱有成见，但现实不容我乐观，所以我安慰妈妈道：“可我想去呢。理发总归是一门手艺啊。书上常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手。”

大姑听了我的话，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说她有急事要马上赶回县城，并给我一个地址，说我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

当天晚饭时，妈妈一直在抹眼泪，我心里也很难过，只有海鸥高兴地说：“姐姐你学了理发，以后我剃头就不要钱了。”

听了这话，我一直在眼圈里打转的眼泪一下就掉了下来。海鸥还小，他还不知道世事的艰辛。可在他还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时候，他就没了爸爸。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响起：“海燕在家吗？”

我向外一看，惊喜地说：“丽娟？怎么会是你？”

丽娟姓张，家住邻村，是我初高中时的好朋友。本来她的成绩很好，谁知在初三时和一个叫陈刚的男同学谈起了恋爱。陈刚初中毕业后便去东莞打工了，丽娟虽然读了高中，但因为一直和陈刚保持着通信关系，学习受到了影响，成绩并不好。

看到我，丽娟拉着我的手一下子哭了：“海燕，我差点就没脸见你了。”

我赶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丽娟咬牙切齿地说：“你们村那个嫁在县城的女人，她是个骗子，前段时间她说带我去学理发，我去的第二天她就逼我卖身。要不是正赶上我爸死了家里人去县城找我，我一辈子就毁在她手上了。”

听了她的话，我和妈妈面面相觑。我们村嫁在县城并且开理发店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白天来我家的那个大姑。

我现在才知道，丽娟的爸爸也是这次煤矿遇难的38人之一。六年的同学情谊，相同的遭遇更加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丽娟说,县城工作很难找,国营企业我们是进不去的,其余的那些小厂进去也是出苦力的,并且工资低到只有一两百。在县城,农村女孩子一般只能做饭店服务员、理发店洗头妹等工作。工资虽然比卖苦力的高一些,但要受人欺负。这些路全被堵死了,那么我们只有外出打工了。

我们家没有什么亲人在工厂打工,但丽娟家却是门户很大的。丽娟开始说想到江浙一带找她表姐堂妹,听说那里虽然工资比较低,但一般是三班倒,不太累,不过外地人非常受排挤。后来,丽娟又期期艾艾地说想到广东东莞去,虽然那边很辛苦,但工资很高。更重要的是,已经在东莞三年的陈刚现在已是一家大型港资制衣厂的烫工班班长了,月工资最高可拿到两千,几次来信都叫她去。

虽然我家在农村,但因为一直有爸爸妈妈呵护,穷人家出娇子,我也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听丽娟这样一说,便赶紧表明想去江浙。丽娟有些无奈:“我妈也要我去江浙,她怕我吃不了广东那边的苦。去江浙也好,那里有许多四川老乡,不怕受人欺负。”

我忽然心中一动:“江浙有许多四川人?那你知道那里有没有湖南人呢?”

丽娟肯定地说:“没有,有也是极少极少的。表姐说那里大多是江浙一带本地人,然后就是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了。湖南人几乎都去广东打工了,陈刚说他班里有一多半是湖南人,那些湖南人经常合伙欺负他。”

我坚决地说:“那我要去东莞!”

丽娟惊讶地问:“为什么?你刚才还说去江浙呢。”

我一字一顿地说:“害死我们爸爸的齐友德就是湖南人,我要找到他,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为爸爸他们报仇!”

丽娟的神情忽然肃穆起来:“好,海燕,我们去东莞!”

在我们决定去东莞时,村里去广东的人都已经回去了,没有人给我们带路。但妈妈们担心我和丽娟是两个女孩,又是第一次出门,怕路上出事。于是我们又等了半个月,在确信广东那边不会再有人回家后,我和丽娟决定动身。

动身之前,按照陈刚的要求,我和丽娟还特地花20元办理了一本《未婚证》。拿到那个绿色的小本本,我心里很不舒服。未婚就未婚,要证做什么啊?

妈妈们这辈子就围着丈夫、孩子、庄稼和锅台转,连县城都很少去,她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几句:“对上司要尊重顺从,对同事要谦虚忍让。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少说话多做事,吃亏就是占便宜,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古训,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和丽娟连连点头,并将这些话谨记心头。于是,在妈妈们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我们终于上了路。

这次离家,一方面是为了找到该死的齐友德,另一方面是为了到城里挣钱给我弟弟读书。

虽然是夏天,但为了冬天时不要花钱买厚衣服和棉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衣服和被褥都带上了。我们和许多初次进城务工的农村人一样,背上背了扎得紧紧的被子,叠得四

四方方的,很像电影里那些急行军的军人。我们手里分别拎着一只满是衣服的蛇皮袋,蛇皮袋以前是盛化肥的,我拎的蛇皮袋上是两个字:尿素;丽娟拎的蛇皮袋上面有四个大字:碳酸氢氨。我们另一手提着吃的东西,吃的东西除了路上的干粮便是装酸菜和辣椒的瓶瓶罐罐。听说那边的东西又贵又不好吃,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我们买的是硬座车票,车上人很多,我们只好站着。原本想有人下车或许能找个位置坐,谁知道越往前走,上车的人越多,天又热,我们就像坐在蒸笼里,浑身被热气蒸得难受。

最恐怖的是经过一个站台时,不大的站台竟然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这些人90%以上是女性,年龄多在30岁到50岁之间,少数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还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差不多有60岁了吧,不过也不一定,农村人一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他们胸前都挂着“巧手拾棉”的纸牌,手上、肩上、背上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个个都被压得弓着腰。火车刚一靠站,这些人便在一个列车员的指挥下,排成一条长龙。大约是都不会排队,队排得七拐八弯的。开始时,他们都拥向一个空车厢,有人说那节车厢是他们包起来的。但随着人上得越来越多,那节车厢装不下了,只好向别的车厢扩充。很快,我们所在的车厢里也挤满了戴着“巧手拾棉”纸牌的人。一时间,过道里,车厢连接处,甚至洗漱间,到处都是人和包袱。直到火车开动了,车站上还滞留着很多没有挤上车的人。

我的身边也挤满了“巧手拾棉”的人,从她们互相之间的议论中,我才知道,她们是到新疆拾棉花的,上这列火车也只是为了转车。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就是“拾花工”。新疆种了很多棉花,因为人少地多,每年棉花成熟季节,当地人捡不完,只好花钱请人。

这些“拾花工”有很多人都不是第一次去了,所以对新疆很熟悉。按她们的话来说:“新疆许多地方都肥得很,地上是白花花的棉花,地下是黑溜溜的石油。”

有一个年老的“拾花工”向一个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描述拾棉花的感受:“新疆的棉花种得又矮又密,棉树的高度只到膝盖,弯腰弯得很低,实在弯不下去了,就蹲一会儿再弯。我第一天干时,累得腿脚也肿了,脸也肿了,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晚上睡觉,两条腿脚都并不拢了。”说到这里,她表情痛苦。

另一个“拾花工”也说:“干活时,手、眼、嘴、脚都要用到。用脚踏开拾过的棉树,眼睛寻找成熟的棉桃,然后用手去摘,要是棉桃上有树叶等杂物,要先叼在嘴巴上。要是蚊虫叮咬,只好让它吃饱了。”

我对面座位上看上去是城里人的老奶奶一直在听她们谈话,听到这里,忍不住问:“那你们用什么化解你们劳动中极端的枯燥辛苦?”

“拾花工”们淡漠地扫了她一眼,没有人接话。

又一个“拾花工”快言快语道:“就是,不知你受不受得了那个罪?你想想,别说弯腰不停地拾棉花,就是让你捂得严严实实地在烈日下站一天,从早上7点干到晚上8点,你能受得了吗?”

较为年轻的“拾花工”朗声说:“你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只要能挣钱,怕什么!可惜



一年只能去挣两个月钱，两个月挣 1000 块，除去来回的车费，剩下总能凑够了孩子上初中的学费吧？”

其余“拾花工”纷纷点头。

可能是因为受了冷遇，刚才问话的城里老太太有些愠怒，用极不友好的语气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工厂里打工呢？现在很多人都到那里打工呢，可以一年四季打到头。”

一个 30 多岁的“拾花工”沮丧地说：“打工都要年轻的、识文断字的，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了，又不识字，到那边找不到工作。我前年去过深圳，那年我都 30 岁了，又不识字，好说歹说也没进得了厂，只好又回来了。”

我不由自主地和丽娟对视一眼，暗自庆幸：“还好我们还年轻，也还识字。否则，说不定也要去新疆拾棉花呢。”但进工厂打工，会不会就比到新疆拾棉花轻松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至想到昏昏欲睡，连那些“拾棉工”什么时候下车的我都不知道。

睡了吃，吃了睡，火车上又挤又脏，连上一个厕所都像打仗一样，不停地越过一个人，洗脸刷牙更不可能。就这样，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到了广州站，我和丽娟的双腿都浮肿、麻木了，乍一站起来，差点儿摔倒。扶着墙站了很久，才勉强可以行走。

我们来之前，丽娟打了陈刚的拷机，但陈刚加班，没间接我们，只是给我们指了指行走路线。他让我们直接从广州坐车到 HM 镇下车，然后坐大巴就可以直达他打工的“金秋”厂所在地了。他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到火车站旁边的省汽车站坐车，虽然在省汽车站坐车要 50 块钱，但很安全。可我和丽娟一走出广州火车站就傻眼了，到处都是车是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是省汽车站啊。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忽然看到前边的马路上有许多去东莞的大巴。其中有两辆大巴上还印着“××体育学院”等这些让人放心的字样。我们赶忙跑过去，一问价钱，只要 25 块就行了，比陈刚说的价钱整整便宜了一半。我们觉得好划算，但想起陈刚的再三吩咐，还是有些犹豫。

于是我和丽娟便又跑到附近的小店打陈刚的拷机，想问一问他这种车可不可以乘坐。我们两个人傻乎乎的，连价钱都没问。谁知等了半个多小时陈刚都没有复机，女店主却催着我们给钱。

丽娟边掏钱边问：“多少钱？”

女店主面无表情地说：“120。”

我和丽娟差点晕过去，一个拷机又没有复机，在我们家只要五毛钱呢，这里却要 120？我鼓起勇气说：“我们不过打了一个拷机，还没回复，怎么会这么贵？”

女店主不耐烦地说：“120 还贵啊，看你们是穷鬼我都少要了呢。”

我还想说什么，丽娟却暗中拉了拉我的衣领，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道何时站了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我心里一寒，赶紧闭了嘴。丽娟乖乖地掏出 200 块递给女店主。

女店主把两张钱在手里理了理，忽然脸色一变，指着一张 100 元说：“这张是假的！”

丽娟惊叫道：“不可能！”她接过钱一看，立刻指出，“这张不是我的钱，一点皱褶都没有。我的钱刚才拿出来时，是叠得四四方方的！”

女店主一愣，随即撒泼般地说：“我说是假的就是假的！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丽娟还想分辩，她身后那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拍了拍她的肩，皮笑肉不笑地道：“姑娘，你也不看这是啥地方？”

我清楚地看到，他拍丽娟的那只胳膊上纹了一个耀眼的刺青。丽娟还想说什么，我赶紧对她使了个眼色，将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和丽娟身上的零钱凑了20元给女店主。女店主接了，用鼻子冷哼了一声。我和丽娟赶紧挽起放在地上的尼龙袋，快速离开。

白白被讹去100多块钱，我们都感到冤枉。

我无意间回头，竟看到刚才讹我们钱的那个女店主正向我们望来，便拉着丽娟，快步向前走去，想尽快离开广场。

刚走到路口，正好那辆大巴车又驶了过来，车门口穿迷彩服的年轻男子立刻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再次问明到HM镇车费依然是每人25元，这时车上已有十几个乘客，有的身边还放着包。回头望了望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小店，我们长舒了一口气，毫不犹豫地上了大巴，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坐了下来。

想象着最多两个小时就会到HM镇，我和丽娟的心放下了一半。因为刚才假钱的教训，我们知道是有人做了手脚。这次我和丽娟都不敢怠慢，早早将50块半新不旧的钞票握在手中，等待买票。

谁知左等右等也没人来卖票，穿迷彩服的那个年轻男子依然不住地在车门口拉人。车子很快又转回了火车站，我们以为可能是堵车了，到第三遍时，我们终于意识到，这车是有意兜圈子的。

正当这时，车门传来了争吵声。循声望去，一个刚上来不久的年轻男子正嚷嚷着要下车，那个迷彩服坚决不让他下。年轻男子虽然不帅，但长相很斯文，穿得也很整洁干净。他说他刚来广州，有急事要赶时间，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几次强行想下车门，但都被迷彩服粗暴地阻拦了，车上一时乱了套，又有几个乘客要求下车。这时，从我前面的座位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人，我以为他也是要下车的，正拉着丽娟也想站起来。没想到这个中年男人三两步冲到车门边，对准要下车的年轻男子左右开弓，年轻男子的嘴角立刻渗出血来，他哭丧着脸说：“你们怎么打人？”

中年男人理直气壮地说：“就打你，怎么着？你再要下车，我还打！”

这时中年男人的身边已经围了四五个同样身强力壮的男人，一个个态度傲慢无礼。要下车的年轻男子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聪明地闭了嘴，乖乖地到后面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看到这一幕，车内所有的人都敢怒不敢言，刚才嚷着要下车的几个乘客立刻噤了声，不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和丽娟紧挨在一起，浑身发抖，不知道这车到底什么时候开走，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